

我的春秋我做主①

最后的霸主

[下]

晋楚相衰中原乱，吴越竞雄东南疾，霸权代有，兴亡延替
家国恩怨与私身情仇，刀光剑影和智计阴谋，审视权力，拷问人性
百年厮杀与混战·群雄逐鹿战国的前夜

海棠栖露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我的春秋我做主①

最后的霸主

[下]

海棠栖霞——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六卿都去哪儿啦之基础理论篇

不错，正如多数人审题时第一反应所意识的那样，此六卿并非指周王朝泛用的顶层政治制度，而是指即便放在整个春秋历史中也独树一帜的晋国六卿。

一个周王朝泛用的顶层政治制度，独被晋国演绎出了别样的风情。如果你认为这其中的主因是晋国六卿的扮演者实在太过牛气，那教你哲学的老师一定会产生深深挫败感。

时势可以造就人，人也可以造就时势。但我们应该明白，这两句论断其实并不具备均等的判定效应。时势造就人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人造就时势却往往只是个别现象。

就晋国六卿而言，当然是先有牛气的制度，再有牛气的扮演者，反之不能成立。在晋文公创设三军六卿之前，晋国也有传统意义上的六卿（以下简称旧卿）。根据学者曾金声先生在其著作《先秦政治制度史》中的论述，旧卿包括太傅、太师、司空、司徒^①、司马和司寇。

这套班子中，政务一般归口于太傅、太师、司空、司徒和司寇；军务一般归口于司马。

唯一的交叠之处，是司空因为主管土木，涉及营垒建设和军队后勤的部分职能。但这不影响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晋国政务和军务的署理权是相互分离的。

晋文公创设三军六卿之后，旧卿的职数遭到削减，似乎只保留了太傅、太师和司空。

六卿和旧卿共济一堂，其职责分工势必要做出新的调整，结合《左传》的记载来看：

六卿专管军务，不参与政务，当时晋国的大型政务活动几乎都是由太傅阳处

^① 晋僖侯以司徒为名，为避讳故改司徒官职为中军。

父和司空士穀主持完成。

旧卿主管政务，可以涉足部分军务，例如忽悠楚军先后后退然后无节操单方面宣布己方获胜的泜水之战，便是太傅阳处父的得意之作。

值得指出的是，六卿并非如同大家想象的那样，一出场就成为晋国的群臣之首。

鲁文公六年，即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在夷地阅兵，拟任狐射姑为中军将、赵盾为中军佐；但太傅阳处父认为不妥，力促晋襄公改变初衷，将狐射姑和赵盾的职务进行互换。不难推断，此时太傅的权势和影响力仍在六卿之上。

不过，六卿随即便实现了对旧卿的反超，这个时间节点仍然是公元前621年的夷地阅兵。据《左传·文公六年》载：“宣子（赵盾别称赵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这则记载话里话外透露出两条信息。

第一条信息是：赵盾出任中军将的同时“为国政”，成为晋国的正卿；六卿也随之包揽了晋国的军务和政务。

第二条信息是：太傅和太师退出卿士集团，沦为了中军将政令的执行者；六卿也随之整体跃升到了晋国官制的顶层。

至此，六卿从一个专业性的军事机构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军政权力机构。这是六卿制度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晋国的卿士集团是不是就此被六卿垄断了呢？答曰不是。晋国还有一种既不同于旧卿，也不同于六卿的卿士。

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以一命命郤缺为卿，复与之冀，亦未有军行。”

罪臣郤芮之子——下军大夫郤缺在箕之战（先轸即死于是役）中立有军功，于是晋襄公以一命授予他卿爵，并恢复其家族因郤芮之故被剥夺的封邑——冀地，但没有授予他三军将佐之职。

杜预为之注曰：“（郤缺）不在军帅之数，然则晋自有散位从卿者。”用现代化的语言表述，就是说：晋国有一种低职高配的卿，他的职务按传统习俗不在卿之列，但又实实在在地获得了卿的行政级别。

当然，我要提醒大家注意，春秋时代的卿一般分为下、中、上三种品级，且

授卿的仪式又分为一命、二命（或称再命）、三命三种（以命数多为贵）。

所以不难想象，郤缺受一命而为卿，肯定只能位列下卿。推而论之，“散位从卿者”都只可能是卿之末流。

这是夷地阅兵六年前的情况。夷地阅兵六年后的公元前615年，晋、秦爆发河曲之战，当时晋国上军大夫赵穿因不忿秦军挑衅，贸然率军出击。

《左传·文公十二年》记载了晋军主帅赵盾听闻赵穿出战后的反应。

赵盾说：“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意思就是说：如果秦国俘获了赵穿，那就是俘获了晋国的一个卿；他们欢天喜地地回去了，我们有什么颜面去见家乡父老？

赵穿以将佐之下而位居卿列，自然和郤缺的性质一样，同属“散位从卿者”。

另外，《左传·襄公七年》（襄公七年即公元前566年）还记载了晋悼公因中军将韩厥告老退休而使韩厥次子韩起继任为卿的事。而通过《左传·襄公九年》的记载，我们又得知，晋国时任中军将由智蒞担任。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韩起仅仅承继其父卿位，而未承继其父军职”的结论。显然，韩起也是一个“散位从卿者”。

但是，自韩起以降，《左传》中就再也寻不出任何“散位从卿者”的记载了。即便是后来名扬天下的大贤羊舌肸，终其一生也止于大夫之职，未能登履卿位。

这说明，借由夷地阅兵总揽晋国军政权力的六卿，又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后，方才将卿爵全部垄断。

垄断卿爵标识着六卿^①的集权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现象：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六卿的权势已然对晋君的权势产生了冲击。

聂淑华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在《晋国的卿族统治》中指出：“六卿集团开始由国君控制下的一个高级职能部门向与国君有分庭抗礼能力的权力机关过渡。”

我们知道，晋国最终就是亡于卿族之手。那么，这个卿权超越君权的节点到底在何时成型的呢？我认为，分际在晋悼公时代。

晋悼公身前，晋君统揽最高的行政和军事权力，六卿总体而言受到晋君的节

① 六卿是个统称，在不同的时期分别表现为四卿、六卿、八卿、十卿和十二卿。

制，虽然这种节制力呈渐趋衰减之势（如晋灵公和晋厉公被权卿弑杀）。

这个阶段，晋君的政权主要体现在任免、命令和杀伐六卿上。

关于任免六卿。

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晋文公）使郤穀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命赵衰为卿……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又《左传·文公六年》载：“六年春，晋蒐于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

再如《左传·成公十八年》载：“二月乙酉朔，晋侯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使魏相、士鲋、魏颀、赵武为卿。”

关于命令六卿。

如《左传·宣公十六年》载：“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

又如《左传·襄公三年》载：“晋为郑服故，且欲修吴好，将合诸侯。使士匄告于齐曰：‘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不协，请君临之，使匄乞盟。’”

再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

关于杀伐六卿。

如《左传·宣公十三年》载：“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

又如《左传·成公八年》载：“晋讨赵同、赵括。”

再如《左传·成公十七年》载：晋厉公剿灭三郤（详见《三郤之戏》一章）。

这个阶段，晋君的军权主要体现在大蒐、亲征以及改革军制上。

关于大蒐。周苏平先生在《春秋时期晋国政权的演变及其原因之分析》中论述道：“根据《左传》的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共举行过八次大蒐礼。晋文公四年，‘蒐于被庐’；晋文公八年，‘蒐于清原’；晋襄公七年，‘蒐于夷’，同年又‘改蒐于董’；晋灵公十一年，‘蒐于黄父’；晋景公五年，‘蒐焉而还’；晋悼公元年，‘阅兵蒐乘’；晋悼公十四年，‘蒐于绵上以治兵’。可以看出，晋国举行大蒐礼主要在春秋前半期，晋悼公以后，晋国不再举行大蒐礼，其原因是君权已由公室下移至

卿族，说明军队已被卿族所垄断。”

关于亲征。段志洪先生在《周代卿大夫研究》中讲到，晋悼公身前，国君^①亲征达二十余次；而晋悼公身后，国君亲征只有寥寥一两次而已。

关于改革军制。我们考察一下自六卿诞生始晋国军制历次的变化情况。晋文公四年，始作三军六卿，次年又设三行；晋文公八年，化三行为上、下新军，共五军十卿；晋襄公七年，取消上、下新军，恢复三军六卿；晋景公十二年，增设三军，共六军十二卿；晋厉公三年，并新军三军为一军，共四军八卿；晋悼公十四年，以新军无帅而从于下军，次年又取消新军，再度恢复三军六卿；及至晋定公时期，六卿变为四卿，不过已不是由晋君主导的改革，而是由卿族血腥内斗造成的减损。可见，晋君改革军制都在晋悼公身前。

晋悼公拥有的权势保留了历代晋君最后的尊严。自晋悼公之子晋平公继位起，晋君的行政和军事权力被严重架空，逐渐沦为晋国政坛一个虚化的符号。与之同步的是，六卿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成为晋国毫无争议的权力中枢。

当时，各诸侯国的有识之士，观察到晋国公室衰微、卿族昌盛的景况后，多有预判晋国政治巨变之语。

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又如《左传·昭公三年》载：“叔向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堇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怙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再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制度设计，晋国可谓成也六卿，败也六卿。

六卿设立前期，因为军政统一在六卿门下，所以晋国的权力体系上下通畅、

① 包含储君，因为储君权力是国君权力的延伸。

左右协调，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势，从而盛极一时。

六卿设立后期，又因为军政权力过于集中，卿强君弱的态势积重难返，强卿各各毁公济私且相互火并，最终导致晋国分崩离析。

以上是从宏观角度对六卿做出的评述，大家不妨将其视为一段导语，尽管又臭又长，但耐着性子读完它的人至少会对晋国六卿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窃以为这很值得。如果你实在提不起兴趣，那就请从下一章开始读起吧。

六卿都去哪儿啦之实践操作篇

从宏观角度看，六卿是一种制度。制度作为基础的盘面，虽然重要性无以伦比，奈何缺乏必要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幸好，六卿拥有复合的构造，从微观角度看，它是一群卿族的集合体。而一旦从人的层面解读六卿，那有血有肉的爱恨情仇就纷至沓来了。

清代巨儒高士奇在其《左传纪事本末》中提纲挈领地指出：“晋之卿族，魏氏、赵氏、狐氏、胥氏、先氏、栾氏、郤氏、韩氏、智氏、中行氏、范氏，凡十一族。贾季奔狄而狐氏废。先穀得罪而先氏废。胥废于郤。栾、郤废赵而赵复兴。厉公用栾氏谮杀三郤，而郤氏废。范宣子逐栾盈而栾氏废。范、中行氏逐于智、韩、魏、赵，而韩、魏、赵复共灭智伯，遂为三晋。”^①

寥寥数语就道尽了六卿近两百年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风云和波澜，不可不谓之经典。

鉴于在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十一家卿族已去其五，所以本章的重心，要放在六家卿族去其二上，亦即范氏和中行氏被智、韩、魏、赵四氏联手驱逐的过程。

正如大风往往起于青萍之末，范氏和中行氏的败亡当然也有着细微的发端。为了尽量把这个事件的始末交代清楚，我预备拐弯抹角从齐国的政治野望说起。

公元前6世纪晚期，中原版图上的霸权隐晦不明。晋国有六卿毁公济私，诸

^① 高士奇列举的卿族是六卿中的主要氏族，那些短时期担任六卿的卿族并未收录在内。

侯离背；楚国有柏举之败，元气大损。两大传统霸主不约而同地处于运势的低谷，天下诸侯因之游移四顾。

素以复霸为政治追求的齐国于是乎相机而动，着手扩张势力范围，先期目标就是谋求建立一个以齐国为主导的东方集团。

作为这个设想的东方集团中的一员，卫国因界于晋国东南与齐国西北的夹缝之间，所以成为晋、齐两国争夺的焦点。

公元前 503 年秋，齐景公邀请卫灵公在咸地会盟。

卫灵公正有叛晋之意，接到请柬后欲启程赴盟。可是朝臣们认为不妥，纷纷劝阻，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卫国的个头而言，得罪晋国要冒不小的风险。

卫灵公很纠结，思来想去，便要了个花招，派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北宫结出使齐国，让齐景公故意逮捕北宫结然后攻打卫国^①。

卫灵公并非癫狂，他是想告诉齐景公：我愿意和你会盟，但阻力很大，你不妨假装以武力相威胁，我则假装迫不得已顺服你。

这样一来，蒙在鼓里的卫国朝臣以及晋国，因为没有抗齐救卫的良策，所以也不好过分指责卫灵公投齐自保。

齐国方面，虽然清楚经由如此这般操作下来的会盟成色并不纯粹，但总归是在争夺卫国的对抗中领先了晋国一个身位，也就乐得配合卫灵公行事。

齐景公遂和卫灵公在琐地顺利会盟。

晋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对卫国动粗又找不到正当的借口，只好气鼓鼓地等待一个合适的反击机会。不过很快，鲁国就为晋国创造了条件。

鲁国结结实实挡住了齐国向中原扩张的去路，历来又非常抵制齐国的扩张。

是故齐国拉拢卫国后，便开始频频攻打鲁国。鲁国也不服软，奋起勇气硬顶上。一时间，双方互有攻守，打得不亦乐乎。

可是，勇气这玩意儿不能当饭吃，战争比拼的终究还是实力。因此几个回合打下来，鲁国渐感疲乏。

公元前 502 年夏，适逢齐国再次入侵，鲁国只好向晋国求助。

① 北宫结之父北宫喜曾发动叛乱，当时卫灵公无暇处置，是故此时打击北宫结以削弱北宫氏。

晋国大喜，扶持鲁国这种具有一定根基的国家对抗齐国是最经济适用的制齐策略。于是，时任六卿的范鞅、赵鞅和中行寅率兵风风火火地赶往鲁国。

齐军估计晋、鲁联军势大，自己讨不到便宜，便赶在晋军入鲁前打道回府了。

晋军一琢磨，何不趁齐国气势正馁，在返程时顺道将卫国扳回来呢？齐国能做初一，晋国就能做十五嘛！

打定主意后，晋军取道卫国归国。

入卫后，晋军要求和卫灵公举行会盟。卫灵公这次是真的迫不得已，只好涨着脸答应了。

晋国记恨卫国去年会齐之事，意欲摧辱卫灵公，所以晋军方面仅仅派了两个大夫——涉佗与成何为代表去参加会盟。

晋国领袖中原百余年，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确实很有优越感，故平时多有以卿士会盟诸侯之举。但这大夫比卿士毕竟又低了一个等次，你要卫灵公浑若无事般与涉佗、成何会盟，显然有点儿勉为其难。

然而慑于晋军的兵威，卫国方面又无法拒绝会盟，因此他们想了一个挽回颜面的办法，提出会盟时由涉佗或成何执牛耳。

执牛耳的学问，我以前介绍过，这里重复一遍。

执牛耳就是指订立盟约的时候，操刀执盘割牛耳取血的动作。

取完血后，盟主率先歃血（用血涂抹嘴唇），盟众依次继之。

与盟者用这样一套仪式，表示彼此之间有天地神灵为鉴，倘若违约，必将遭受神灵的惩罚，最终将像牛一样死亡。

就抽象意义而言，我们常用“执牛耳”来指代盟主；但从执牛耳以及歃血的具体操作细节而言，执牛耳的人往往又不是盟主，而是某一个盟众国代表。

盟主之所以不执牛耳，是因为操刀端盘子乃杂役，做了的话有失身份（古有“君子远庖厨”之语）。

因此，执牛耳的活计一般交给某一个盟众国代表去做。这个盟众国代表被称为“尸盟者”，意即操办盟会具体事务的人。

也就是说，真正体现盟主威仪的举动不是执牛耳，而是首歃，用专业术语来表达，就是“卑者执之，尊者涖之”。

卫国方面提出由涉佗与成何执牛耳，不失为维护卫灵公尊严的好办法。

不过，涉佗与成何既然带着摧辱卫灵公的使命而来，岂肯轻易让卫灵公下这个台阶？面对卫国关于“晋执卫淦”的提议，涉佗与成何嗤之以鼻。

成何说：“卫国只不过比于我国的湿地和原地，卫君又怎么能视同诸侯？”

依周制，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

成何的字面意思是强调：卫国是一个小国，卫灵公名为国君，但实际影响力只不过相当于晋国的卿士。

话外音却是说，你卫灵公国小民寡，能和晋国会盟已是天大的荣耀，竟还敢争首歃？别给脸不要脸！

等到正式会盟的时候，晋方代表涉佗还是如卫国所愿担任了尸盟者，一切看起来很和谐的样子。

可是就当卫灵公用手从敦盘里蘸好牛血准备往嘴唇上涂抹时，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涉佗忽地推了卫灵公的手一下，于是牛血顺着手掌淌到了卫灵公的手腕上。场面瞬间变得非常难堪。

须知，设置尸盟者的用意，本就是为了防止盟主亲自操刀时出现诸如身体被牛血玷污的现象。

现在涉佗来这么一家伙，等于将卫灵公从盟主的位置上一把拽了下来。卫灵公顿时觉得自己的尊严都被雨打风吹去了，一颗心啊，拔凉拔凉的。

场边的卫国大夫王孙贾见状疾趋而进，抗议道：“结盟是用来伸张礼仪的，你们非礼而行，卫君又如何能接受这个盟约？！”双方不欢而散。

卫灵公惨遭羞辱，自然是气得花枝乱颤，但他随即又发现，这其实是一个背晋投齐的契机，如果运作得好，完全可以改变朝臣们先前顺晋背齐的立场，最终从形式到实质上完全倒向齐国。

于是，他在王孙贾的协助下导演了一场苦情戏。

离开会场后，卫灵公没有回到公宫，而是住在了都城外面。

群臣诧异，问其故。

卫灵公苦兮兮地说，（因与晋国结盟时被牛血玷污）我让社稷受到了耻辱，没

脸再见你们了；你们还是另立他人为国君吧，我无不服从。

群臣觉得卫灵公挺可怜，纷纷劝阻：别，这又不是您的过错。

卫灵公顺势编了一个故事：还有更让人忧虑的事呢，晋人责令我的儿子和你们的儿子都到晋国去当人质。

群臣大抵认为反正是要亲晋，送儿子过去也没关系，遂答道：只要利于国家，那就送吧，我们都愿意。

卫灵公不动声色地说好吧。说罢回宫，立即着手遣送人质之事。

等到人质们启程赴晋的那天，大夫们已有了不舍之意，只是憋在口中谁都没说出来。

这时，王孙贾挺身而出，说先别急着送。大夫们闻言，暗自欣喜，刚要鼓掌通过，却听王孙贾口风一转：不如把工匠商人也一起送过去吧。

群臣骑虎难下，硬着脖子说那好那好，其实心里已经叫苦连天。啥？非但要送人质，而且还要加码，把工匠商人也一起送过去？这工匠商人虽然都是些不入流的角色、平时可打可杀，but，一旦少了他们，爷的品质生活怎么得到保证啊？真是坑爹哟！

等到人质和工匠商人启程赴晋的日期定好后，卫灵公召见群臣。王孙贾似乎不着边际地提了一个问题：“假如卫国背叛晋国，而晋国攻打卫国五次，卫国会危险到什么程度？”

奇迹发生了。那些以往口口声声要亲晋的朝臣们不约而同地答道：“就算晋国攻打卫国五次，卫国也一定还有能力继续作战！”

卫灵公微微咧了下嘴角，心里暗骂了一声“贱人”。

王孙贾则把话挑明：“既然晋国攻打卫国五次，卫国都顶得住，那说明卫国转圜的空间很大嘛！我们何不先背叛晋国？就算晋国攻打卫国，我们也可以等到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遣送人质也不迟呀！”

在私心的干扰下，群臣被王孙贾偷换“背叛晋国”和“不遣送人质”概念的把戏蒙住了，一致赞成背叛晋国。

晋国一看卫国来真的，自知理亏，赶紧巴巴地通知卫国，说要带着诚意重新和卫国结盟。

这一次，卫国君臣同心，断然拒绝。

晋国恼羞成怒，邀集鲁国于同年秋先后攻打卫国以示惩戒。

齐国挺讲义气，于次年秋为卫国张目，出兵攻打晋国的夷仪。

卫国也相机行事，在齐国的掩护下攻打了晋邑邯郸^①，并一度攻破了邯郸城的西北角。

晋国如临大敌，从临近的中牟调兵，将齐军击退，解了夷仪之厄。卫军也见好就收，掉头就走。

又过了一年，公元前500年夏，晋国中军佐赵鞅率军围攻卫国都城帝丘以报夷仪之役。

邯郸的邑宰叫邯郸午（他的曾祖父就是那个桃园弑君的赵穿），欲报去年卫军攻打邯郸之仇，也带着七十个步兵参加了围攻帝丘之役。

晋军围城日久，虽说也取得过一些诸如“杀人于门中”的战绩，但一直未能将帝丘整体拔下。

因为齐国在一旁虎视眈眈，晋军担心局势生变，遂提出和卫国进行谈判，想捞点好处闪人得了。

卫国正同样对前景惴惴不安，不知自己在晋军的铁桶阵中能否坚守到底。见晋军退而求其次，卫国焉有不赞同之理？

双方一拍即合，放下武器上谈判桌。

最终，晋国杀了挑衅卫灵公的涉佗（成何则畏罪逃往燕国）；卫国则贡献五百户人口给晋国，晋国将这五百户人口就近安置在了邯郸。

晋、卫罢兵貌似是一种交战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但对晋国而言实际上应该算作失败。

因为，在晋、齐争斗的大格局中，晋国没有将卫国这颗重要的棋子抢到手；而且，攻陷帝丘不成，更加消除了卫国对晋国的顾忌，使得卫国坚定地投向了齐国（且于公元前497年春与齐国联军攻打了晋国东部）。

这种微妙的局势，相关诸侯各国都心领神会，接下来该怎么调整外交策略，

① 夷仪和邯郸都在华北平原上，距离齐国和卫国比较近。

当然用不着旁人再额外提点。

于是，郑国、鲁国和卫国陆续归附齐国^①，宋国亦因使臣乐祁遭晋国野蛮对待而对晋国心存芥蒂，齐国筹建东方集团的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

乐祁之事是一个展示晋国六卿内斗而误国的典型案例，不妨一述。

公元前504年，晋国内外交困之际，宋国主动派重臣乐祁^②访问晋国以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

宋国追随晋国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乐祁所属的宋国乐氏，以前一直都是拜在晋国的范氏门下。

但是，乐祁对现任范氏宗主——晋国中军将范鞅很不感冒。经过深思熟虑后，乐祁决定改换门庭，投靠范氏的政治对手赵氏。

因此，当上军将赵鞅代表晋国在绵上为乐祁接风洗尘时，乐祁向赵鞅献上六十面用黄杨木制作的盾牌^③，以为进阶之资。赵鞅笑纳了。

乐祁和赵鞅把酒言欢，范鞅自然是火冒三丈。既然你无情，就别怪我无义！

范鞅对晋定公说，乐祁身负国事访问的重任，还未正式朝见晋君就私自喝酒，这是对宋景公和晋定公两位国君的大不敬，“不可不讨也”。随即将乐祁抓起来关进了大牢。

这一关就是两年。其间，诸侯叛晋之势愈演愈烈，晋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

公元前502年，赵鞅忧心忡忡地对晋定公说：“诸侯之中唯有宋国仍在尊奉晋国。晋国好好接待宋国的使者还来不及，为何要拘捕他（指乐祁）呢？这不是自绝于诸侯吗？”

范鞅岂肯成全赵鞅，于是狡辩道：“晋国扣押了他三年（前后跨越三个年头），现在又宣布无罪释放，宋国必定会因怨恨而背叛晋国。”

话虽这样说，范鞅作为晋国当家的，也实在难以承受强行扣押乐祁所带来的各方压力。斟酌再三，范鞅还是同意把乐祁放了。

不过，打压赵氏的念头就像吃饭拉屎一样，早已成了范鞅的生物本能。因此，

① 鲁国终于忍受不了晋国六卿的专横了，同时又受到了齐国的利诱。

② 时任司城，宋国六卿之一。

③ 黄杨木质地坚硬，用它做的盾牌比较珍贵。

即便同意释放乐祁，范鞅也准备尽其所能阻碍赵氏和乐氏相互靠近的步伐。

基于这个考虑，范鞅私下对乐祁说：“寡君害怕不能侍奉宋君，所以没有让您回去。您姑且让濶（乐祁的世子）来代替您吧。”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说：晋国担心宋国会背叛晋国，所以扣押你当人质；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但必须让你的世子濶来接替你继续当人质。

心底里的盘算却是：以世子濶来牵制乐祁，使得乐祁归国之后，乐氏不敢和赵氏过于亲近，从而达到抑制赵氏的目的。

乐祁的家宰陈寅劝乐祁慎重行事。晋国如此粗鲁无礼，宋国迟早会背叛晋国，倘若把世子濶送到晋国来，那与送肉上砧板又有何异？

可是乐祁顾不了这么多了。送世子濶来晋国虽然有风险，但听天由命也不是长久之计，自己总不能在晋国把牢底坐穿吧？于是，乐祁答应了范鞅的要求，然后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不过乐祁万万没有料想到，这是一次无甚作用的妥协——当他行至太行山麓的时候，突然死了。

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为范鞅捏把汗？人家乐祁活蹦乱跳而来，无端受了两年牢狱之灾且不说，还莫名其妙地把性命丢了，宋国那边可不好交代哦！怎么办怎么办？

当然，困难再多，办法总是有的，如果人能够做到脸比墙厚心比墨黑的话。而以范鞅的修为而言，这并不是一种多么遥不可及的境界。

范鞅的应对措施很简洁、很干脆。把乐祁的尸身扣留下来，给宋国传话：宋国若愿意和晋国结盟，就可以把乐祁的尸身领走；否则的话，哼哼，晋国就把乐祁的尸身放那发酵。

大家瞧瞧，在处理乐祁的问题上，范鞅哪还有一丝一毫国家为重的情怀？

人家乐祁无论投靠范氏还是投靠赵氏，总归投靠的是晋国没错吧？你范鞅堂堂晋国正卿，为了倾轧赵氏而不惜再三羞辱宋国最重要的政治派别——乐氏（时宋国六卿乐氏占据三席），是不是太丧心病狂了点？

乐祁的案例乃窥豹之管，从中不难想见晋国衰败之势。但我讲述这个案例的主要用意，是想牵扯出晋国六卿之间的敌友关系。

我们先看下公元前 501 年范鞅死后晋国六卿的构成：

中军将	智 跖	中军佐	赵 鞅
上军将	中行寅	上军佐	韩不信
下军将	魏曼多	下军佐	范吉射（范鞅之子）

六卿分别来自晋国的六大世家，分布状况看起来均匀且清晰。但是，因为历史渊源和现实纠葛，他们之间的敌友关系一点儿都不均匀，一点儿都不清晰。

要把这个关系扯清楚那就是一部春秋晋国史，所以我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暴力划分。

中行寅和范吉射是儿女亲家，所以中行氏和范氏的关系非常紧密。附带的，邯郸午是中行寅的外甥，所以邯郸氏和中行氏的关系也不错。

赵氏和范氏不对眼前面已经说了。而敌人的朋友约莫也可归为敌人一类，所以赵氏和中行氏的关系必定比较紧张。

赵氏和韩氏历来就相互提携，长期是盟友关系。

韩不信和中行寅相互憎恶；魏曼多和范吉射相互憎恶；晋大夫梁婴父受到智跖的宠爱，智跖想为梁婴父谋取卿位；范氏族人“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而欲为乱于范氏”。

鉴于中行寅和范吉射休戚相关，是故韩不信的利益、魏曼多的利益、智跖的利益、梁婴父的利益和范皋夷的利益得到了部分融合，他们的共同目标是驱逐中行寅和范吉射。

智氏对赵氏持防范和排挤态度，但智氏对中行氏和范氏更为忌惮，所以智氏暂时可以容忍赵氏。

而且，因为韩氏和赵氏交好，韩氏又和智氏、魏氏有利益交集，所以在特定的背景下，智氏、赵氏、魏氏和韩氏可以结成宽泛的同盟。

当然，不用我强调，大家也应该能意识到，所谓特定的背景，就是指对付中行氏和范氏。

总结一下，目前六卿大致可以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中行氏和范氏（以下简称中行派），另一派是智氏、赵氏、魏氏和韩氏（以下简称智派）。

中行、范、智、赵、魏、韩六氏垄断六卿之位已逾半个世纪。之前，他们尚

能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不过，当时间进入公元前5世纪时，六卿之间的矛盾已经突破阈值，郁积已久的火山终于爆发了。

公元前497年，赵鞅以赵氏大宗宗主的身份命令赵氏小宗宗主——邯郸午，将公元前500年卫国献给晋国并安置在邯郸的五百户人口转徙到赵鞅的重镇——晋阳去。

邯郸午和本氏的大佬一合计，觉得这事挺难办。

人口和土地是春秋时代最为宝贵的资源，五百户人口对于作为晋国新兴城邑的邯郸而言，不是个可有可无的小数目。

更为重要的是，邯郸氏疏赵氏而亲中行氏，如果顺从赵氏的话，必然会引起中行氏以及范氏的恚怒。

可是，如果不遵从命令，邯郸午又面临着赵鞅的家法惩处，即便是中行氏和范氏也保不了他万全。

挣扎良久，邯郸方面想出了一条折中之计：五百户人口还是给赵鞅送过去，不过不是直接送，而是先攻打齐国边邑，然后等齐国反攻邯郸时，假装害怕城破而将五百户人口转移到晋阳去。

如此，则既填饱了赵鞅的胃口，又封住了中行寅和范吉射的嘴，可谓里外齐全、左右兼顾。

然而，邯郸午还是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

赵鞅索要五百户人口，固然以削弱邯郸氏为基本诉求（实质上是削弱中行派），但他期望的结果，却不一定仅限于从邯郸氏手中获取这五百户人口，如果方便的话，他也不吝把脚迈得更开一点儿，把手下得更狠一点儿。

因此，当邯郸午按照自以为是的完美计划先攻打齐国再转移五百户人口时，赵鞅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把事态扩大的好机会（实质上是加重削弱中行派的程度）。

于是赵鞅以邯郸午转徙人口的行动迟缓为由将其拘捕，并对邯郸方面传话说：“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

“讨”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没收家产是讨，收押监禁是讨，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也是讨；骂是讨，打是讨，杀也是讨。